

『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

主编 林其燊

副主编 施炎平

五缘文化与中华精神

施炎平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

主编 林其銓

副主编 施炎平

五缘文化与中华精神

施炎平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据于五缘文化的思考,力图突破以往或分源别派、或囿于学科单列的研究视界,集中于人际缘分关系及其社会沟通层面,考察和梳理中华文化体系之确立及其架构;并揭示中国人历来有“崇五”的思维心结,善于通过“五行”、“五方”、“五伦”等观念展开为五缘人际网络的建构,以彰显中华文化之整体性、系统性特征。是为本书立论依据和思想指导。

本书主要内容侧重于“五缘文化基因”的考量,旨在阐明中华文化之人文精神的内涵及其特质;又从“五缘归宗”、“缘分价值认同”观念契入,确认中华历史文化之价值体系核心在“有序和谐”境界的追求;进而概括、论述“刚健与厚德”、“修己与安人”、“真诚与守信”、“公平与正义”、“柔远与睦邻”五对关系范畴,说明何以为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之基本构成,并积极评价其现代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缘文化与中华精神 / 施炎平著.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3.9

(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 / 林其铨主编)

ISBN 978-7-5608-5225-6

I. ①五… II. ①施…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②中华民族—民族精神— I. ①K293②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1080 号



《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

主 编 林其铨 副主编 施炎平

五缘文化与中华精神

施炎平 著

责任编辑 季 慧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陈益平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49 000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5225-6

定 价 39.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涵的“五缘文化”说，自1989年4月在福建省漳州市“纪念吴本诞辰10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五缘文化与纪念吴本》论文中提出，迄今已有24个春秋了。在众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参与研究和开拓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已公开出版专著、文集九种：《五缘文化论》（林其铨著，1994年）、《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编，1997年）、《五缘文化与市场营销》（林有成著，1997年）、《五缘文化力研究》（吕良弼主编，2002年）、《海峡两岸五缘论》（吕良弼主编，2003年）、《五缘文化概论》（林其铨、吕良弼主编，2003年）、《物缘文化研究》（林建华著，2004年）、《五缘文化：寻根与开拓》（林其铨主编，2010年）、《五缘文化与两岸关系》（王碧秀主编，2010年）。此外，上海社会科学院还编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五缘”研究成果选集》（2010年）。在国内外报刊公开发表的论文、文章，数以千计。在实际应用领域，从最初对外开放的“三引进”（引资、引智、引管理）扩及侨务、两岸关系、社区建设、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经贸网络。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的拓展，也催生五缘文化研究机构和社团的出现：1993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率先成立“五缘文化与华人经济研究室”；1995年12月，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注册成立；1996年11月，福建省五缘文化研究会宣告成立；2009年10月，美国五缘文化协会（Five Yuan Culture Association in USA）在美国加州洛杉矶注册成立。由此可见，五缘文化说跨越国界和意识形态的阻隔，穿越政治和经济的界限，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缘文化说的提出，是受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东南沿海改





革开放实践成功经验的启迪和对引进西方管理与实际运行机制的文化环境的思考而产生的。所以,五缘文化研究是从实证性、应用性研究起步,初期侧重实践经验、历史资源的调查,从文化、经济互动的角度考察五缘文化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作用,论证五缘文化生存空间的客观性和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也逐步从经验性、实证性向学理性、本原性的方向深化,从而由外在性的描述向精神内核、元典传承、古今转化、中外沟通等领域探索。五缘文化研究涉及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民俗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哲学等诸多学科,具有边沿学科性质。五缘文化研究吸引了多学科众多学者,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介入,用不同学科的视野观照,因而大大丰富了五缘文化研究的内容。在众多学者经过20多年的辛勤耕耘下,五缘文化说已初具学理构架,然而作为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应当说还有很大的理论空间,需要继续丰富、深化和完善。

自由与伦理出自人类自然人和社会人的二重性,人类社会不能没有自由,也不能没有伦理,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自由与伦理的和谐统一。但是,不同的民族各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道路,为应对环境(自然的、社会的)的挑战,选择适于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各民族不同的心理经验积淀和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同样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道路,因而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心理素质和文化。与西方相比,中华文化在观念上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二是整合系统的思维方式和格物致知同体悟致智相结合的致知途径,以及观物取象、寓意于象、连类比物、切类指事的表达方式;三是以人为本追求有序和谐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些核心理念体现在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上,便是群体本位、伦理中心,从初民的自然人伦进而宗法五伦,再到五缘,发展到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境界,表现形态随历史发展而有变化,但核心理念却稳定贯穿始终。

中华民族以远古的华夏族为骨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像滚



雪球似地吸纳诸多民族参与自然形成了多元一体、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文化代代相传持续了7000余年不曾中断的伟大民族,这是世界2000多个民族中所仅有的。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中多灾多难,遭遇过种种危机,但凭借自身的勇敢和智慧,最终都能战胜灾难、克服危机,得到更加壮大的发展。这证明她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何方,值得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认真思考和求索。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在其名著《艺术哲学》中提出了“精神地质形态”说。他认为精神文化从远古到现代,犹如地质学的积层,由今溯古可以看到:“好比松散的冲积层,完全堆在浮面”;“往下去是青石,云石,一层一层的片形石,非常结实,抵抗力很强”;“再往下去是太古时代的花岗石,埋在地下不知多少深,那是全部结构的支柱,千百年的攻击力量无论如何猛烈,也不能把那个岩层完全去掉”。又说:“每个民族的情形都是如此;只要把历史上的某个时代和它现代的情形比较一下,就可发现尽管有些次要的变化,民族的本质依然如故。这便是原始的花岗石,寿命与民族一样长久”。所以,“在最初的祖先身上显露的心情与精神本质,在最后子孙身上照样出现”。(《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51、354、355页)。丹纳所说的民族精神地质形态埋在最深层、成为“全部结构的支柱”的“花岗石”,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是产生于人类轴心文明时期(公元前600—1000年)的元典文化,或说是民族的文化元、文化基因,这就是民族文化最具有生命力的源头活水。《易传》中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有人认为其中蕴含的奋斗精神和兼容精神就是中华民族魂,时代再怎么变化,这种精神都具有永恒价值,这大概就是中华文化结构的重要支柱,也就是丹纳所说的埋在民族精神文化最深层的“花岗石”。

民族文化的核心理念在传承中有其稳定性,但她存在的形态不是僵死不变的。民族文化既有继承又有变化,犹如穿越时空滚滚向



前汹涌流动的河流,她浸润着经过的两岸大地心田,鲜活地呈现于历史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之中。精英思想、典籍文化正是历史上各个时期社会生活的提炼、写照,但不可能囊括全部。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滋润着民族代代成员的心田,积淀为心理素质,成为行动的潜在指南。所以,真正的民族文化源头活水是不会干涸的,它与各个新历史阶段出现的新因素结合,化为富有生机的社会文化活水,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鲜活形态。就社会结构、人际网络发展中的“五缘”形态而言,它既是中华民族“群体本位”、“伦理中心”核心理念的外化,但又与时俱进,从原生封闭型到次生过渡型,再到再生融合型的发展过程,因而我们不能用僵化的眼光看待它。五缘文化是基于人性即社会性和民族性自然形成的“王道”文化,而不是依靠强力而形成的“霸道”文化。社会资源潜藏于社会人际网络之中,五缘文化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对人群起凝聚、调谐、纽带、桥梁作用,形成社会人际网络。因而五缘文化具有理论和实际应用的双重品格。在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中,只要摆正法、理、情的位置,同公权力加以区隔,五缘文化便能发挥其潜在的无穷正能量,描绘出构建和谐社区、和谐社会的路线图,成为实现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软实力的一种形式。

五缘文化研究可以有两条进路:一是从历史典籍中找出源头活水,追源溯流、因枝振叶,撷取精华,探讨现实意义;二是从现实生活中发现活水,再找活水源头,观澜溯流、振叶寻根,探索今古文化链接根据。《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可谓是两路并进,既沿波讨源追寻五缘文化的文化根、心理源;又由隐及显,探索五缘文化在民俗、社团等载体的存在形式,及其现代功能与作用;诸因素的综合,由微观到宏观,最终转化成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软实力。本丛书由此两重进路推进五缘文化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是初衷,而其宗旨是基于中西比较考察的背景,突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论题,力求通过学理性、时代性、实践性相结合的探索和研究,深化五缘文化的理论内涵和思想意蕴,拓展其实际应用的广度和效应,使五缘文化的推广和弘扬,成为促进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资源,融入



现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要素；进而探讨五缘文化的未来发展，并阐释其对跨文化沟通和全球文化建设的价值和功能。

丛书五册，分别于不同角度和侧重点展开。丛书各册的中心内容是：

第一册《五缘文化与中华精神》(施炎平)，着眼于人际缘分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层面，梳理和概括出中华文化的“五”型思维模式，来探索五缘文化的历史渊源和思想流变，进而考察和总结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价值体系，以为现代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借鉴资源。

第二册《五缘文化心理研究》(蒋杰)，应用现代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结合深层的文化分析与比较，在阐述“文化心理”概念的基础上，梳理了“五缘文化心理”的基本要素，基本特征，形成原因，并探讨“五缘文化心理场基本结构及效应”发生的机制，以推进对五缘文化心理源问题的研究。

第三册《五缘民俗学》(郑土有)，以文化上的“缘”、“俗”之辩为契入点，探讨了五缘文化之“因缘生俗”、“由俗显缘”及“藉俗固缘”的民俗生态系统，力图建构一个五缘民俗学的体系框架。

第四册《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研究》(赵红英、宁一)立足历史和现实，对海外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因缘成链，落地成团，从守望相助、支撑发展，到争取平权、共同发展，再到融入主流、开放发展的过程及其功能变化特点，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角度进行探索，力图展示多如繁星的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众生态。

第五册《五缘文化：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施忠连)着重论述缘分观念的形成、演变及其哲学意义，揭示五缘文化人文主义精神价值和社会意义所造成的各种生态特征和功能，在此基础上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上，展示它们所发挥的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作用。作者强调作为大众文化的五缘文化民族软实力，其所显示的不同于西方概念的软实力，是中华文化独有优势所在，并且提出发展五缘文化应当成为中华复兴的民族战略。



各册作者从不同学科的角度介入,用不同的视野考量,内容各有侧重,但相辅相成,形成有机整体的学理构架。这是《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预设的本意,能否实现有待于读者的检验。

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应对环境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因此世界文化是多元的。民族无论大小,各有其特色和长处,没有优、劣之分。在当今“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各民族间的距离拉近了,交流频率提高了,彼此的依赖度更强了,异文化的交流、碰撞、学习、吸收、融合的机会更多了。现在中国正在崛起,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梦,因此民族主体要自觉,理论要自觉,文化也要自觉。我们既要摆脱百年来由于特殊的际遇而形成对西方文化体系的依傍,也绝不能妄自尊大、惟我独尊,重蹈西方霸权文化的老路,应该秉承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十六字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发展共赢,共圆世界梦。

《五缘文化与现代文明》系列丛书的编纂是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自1995年成立以来又一项重大集体项目,课题研究和丛书出版得到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及新加坡郑添文、许婉华夫妇和上海兰庆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盛晓萍、罗文耀伉俪的资助,同济大学出版社也给予很大支持,罗义俊教授带病参加了丛书的总审工作,责编季慧博士也付出了很多辛劳,此外还得到诸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林其燮

2013年8月于上海



目 录

总序

导论 中华文化精神的重构与弘扬	(1)
第一节 中华崛起、文化为先	(2)
第二节 五缘文化:契入点与新思路	(4)
第三节 揭示中华文化精神特质	(9)
第四节 推进中华文明全面振兴	(12)
第一章 原“缘”:回溯中华元文化	(16)
第一节 元典文化与中华元文化	(16)
第二节 元、缘相契与缘分观念	(19)
第三节 “中华缘文化”何以可能	(23)
第四节 “人际缘分”的文化学解读	(25)
第五节 “人际缘分”的根因性分析	(41)
第二章 “五”型建构:中华文化体系之初立	(45)
第一节 五:一个独特的数哲学概念	(45)
第二节 五行:中国人思想律的塑造	(48)
第三节 阴阳五行:中华文化创制之骨架	(55)
第四节 五伦:德、政合一的思想建构	(61)
第五节 五缘:五伦系统的转换与超越	(71)
第三章 五缘网络:中华文化体系之整合	(85)
第一节 六经:“互补一体”的王官学	(85)
第二节 诸子:一源异流与殊途同归	(92)
第三节 “三教合缘”的文化集成	(101)
第四节 五缘思维与中华文化建构模式	(109)





第四章 情谊亲缘:中华文化之基础与核心	(114)
第一节 宗法制度与亲缘纽带	(114)
第二节 孝:亲缘的维系与强化	(120)
第三节 礼:亲缘关系的仪制安排	(124)
第四节 由血缘亲情到情谊亲缘	(128)
第五节 “兼爱”与情谊亲缘的相容	(138)
第六节 亲缘与地缘、神缘的互相渗透	(141)
第五章 五缘基因:中华文化之人文精神	(150)
第一节 “中华文化精神”的诸种解读	(150)
第二节 五缘基因与人文精神	(152)
第三节 中华人文意识之宇宙论根据	(155)
第四节 中华人文精神四大特质	(165)
第六章 五缘归宗:中华文化之价值体系	(172)
第一节 价值观念与价值体系	(172)
第二节 “义利之辩”:中华价值观之确立	(173)
第三节 “有序和谐”:中华价值体系核心建构	(176)
第四节 中华价值体系五项基本理念 ——五缘缘分的价值认同	(180)
结束语 中华文化的全球结缘及其世界意义	(193)
主要参考文献	(196)



导论 中华文化精神的重构与弘扬

中华文化精神,应该是中华民族的群体人格和品性特质在文化中的凝练和呈现,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数千年演变、发展的精神积淀与价值结晶。

关于中华民族的界定,本书采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意识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经历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的。“中华民族”这个词,特指历史沿革至今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三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六个民族单位是多元的,但都归结为中华民族的一体,故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①

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而言,五十六个民族都是平等的,各有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然而,联系民族融和与国家形成的背景,从中华文化精神的凝练及其早期发展来看,中华民族却是以华夏(汉)民族为基干和主体,不断融合其他民族而产生的。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国民族譬如一大水系,乃由一大主干逐段纳入许多支流小水而汇成一大流的。”他把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划分为四个时期,称其第一期“从上古迄于先秦。这是中国民族融和统一的最先基业之完成。在此期内,中国民族即以华夏族为主干,而纳入许多别的部族,如古史所称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类,而融和形成一个更大的中国(华)民族。这便是秦、汉时代之中国人了”。^②始于秦汉时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正式确立,与此相适应,“大一统”的中华文化体系获得建构形态,其精神价值亦基本凝成。

有鉴于此,本书据于五缘文化思考,力图深入于中华文化精神的透视,就着眼于汉语言文字系统的文献史料,探讨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之创制及其基本精神,旨在借鉴五缘文化和缘分建构的观念,来梳理和概括中华文化体系之架构;又联系五缘网络结构,阐述中华文化之整体性、系统性特征;并从“五缘文化基因”的考量,说明中华文化之人文精神的内涵及其特质;进而以“五缘归宗”观念立论,在“五缘缘分价值认同”的基础上,揭示和重建中华历史文化之价值体系的核心及基本观念。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88年在香港的讲演,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②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页。



第一节 中华崛起、文化为先

中华民族的振兴,不仅是经济的崛起和实力的增长,更应该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振兴。这种民族精神的振兴,很大程度上是中华文化精神的再现与重扬,至少应该有两方面标志:一我们能否达到对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和核心内涵的基本共识,形成关于中华文化历史价值演变趋势的认同;二这些基本共识和价值认同能否转化为全民性的理解和接受,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因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软实力。

真正实现这两方面标志的要求,我们有许多新的挑战需克服,有许多艰巨的任务要完成,更要做许多创新研究和应用推广的具体工作。

举例来说,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美国馆发生的“展示效应”,就很值得我们反省和深思。我曾问过许多学者、企业家和大学生:参观美国馆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是什么?大多数人认为美国馆在刻意推介“美国精神”。是的,美国人主要不在展示他们的经济成果和发展经验,而是很实惠、很有效的采用现代传播工具和手段,多方面诠释“多元、创新、乐观”三位一体的“美国精神”。他们努力让人相信,“美国精神”的这三项内容,看似简单、通俗,却简明、扼要,是上至国家精英下至普通民众都有语言呈现和行为落实的,在社会生活层面当然有相对广泛的共识,而且贯彻于从孩童开始的全民教育体系,并延伸至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和发展理念。显然,美国人在精心策划、着意展示经济、科技发展背后的精神价值,积极推行他们的文化软实力和国家巧实力。应该看到其中有“美国价值认同”的因素在起作用。

反观我们中国馆,建筑确实宏伟,气派确实很大,展示内容丰富多彩,发展成就令人惊叹,但仔细回溯,很少让人看到、看懂这些成就与“中华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灵魂”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国人也难以真正领会世所热议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背后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究竟是什么?我们当然用不到移植美国的价值观,可我们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及群体认同意识当如何塑造与提炼,又怎样转化并落实于社会发展和人们行为规范的层面?!

此外,我们还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精神”的课题研究和专门著作、论文发表就很多,政治层面和广大民众也有很高的探讨和追求热情。但我总觉得和时代要求、形势发展相比,存在着许多差距和不足,尤其缺乏能以古今之变、中西之争的视野和思路进行剖析和反思,推动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中华精神的现代转化,并在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实践中得到呈现的。



另外,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的民族在广泛的社会群体层面上,还没有形成对自身文化精神的认同,那不仅是缺乏文化传播、教化推行的广度和力度,更多的是我们对民族文化研究精神的研究、理解和把握上还没有到位,甚至是失位和错位,那问题就显得严峻起来了。

现在,我们国家又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又是实现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这是现阶段中国最鼓舞人心又切实可行的国家发展战略,在社会各阶层都有十分广泛的回应和认同。

因为这样的国家发展战略,正是近百年来中国几代先进人士探索追求、努力奋斗的事业——实现民富国强与文明进步的双重目标的聚焦和提炼,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化之路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而中华民族的复兴,其精神内涵则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并同步实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创造性转化,这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切实把握到时代脉搏,并凝练和提升了民心、民意、民情的。

为此,我们需要通过理念更新和思路突破,来进一步探讨、诠释和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切实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提供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

这种理念更新和思路突破,主要选择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突破迄今仍然延续的学派分流割裂的观念和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下,学术文化界不断有人倡导儒家、道家甚至墨家的现代复兴,热衷于提出所谓现代“新儒家”、“新道家”、“新墨家”的建构框架,试图顺着一个预设的轨道,来梳理和概括中华文化精神。这样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某个侧面认识和理解中华文化体系及其精神,但实际上忽视甚至否认了中华历史文化中的“百家归流”、“三教合一”的发展趋势,当然无法认知和把握中华文化的整体系统,也无法真正揭示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

另一方面,要突破过度学科分类、专业分割的眼界和视野。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自在的中华文化体系,不是在学科分类、专业分割的轨道与框架内演变发展的。事实上,中华文化没有像西方那样早在古希腊时期就确定了分学科的知识体系。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是“关于普遍知识的学问”,可分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第二哲学,相当于自然科学;第三哲学,对应于人文社会学科。又具体区分物理学、动物学、心灵及生命学科、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及诗学等。这对于西方文化后来的发展影响很大,使之带上明显的学科





分类轨迹。

表面上看,中华文化的发展虽长期呈现“学派纷争、分合不定”的景象,但内在的思想观念及精神价值(道)却贯穿着“殊途同归”、多元融合的发展主线。所以,古代中国的图书归类只是笼统分经、史、子、集,直到明末清初才有辞章之学、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后来康有为加了个经世之学)的泛学科说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学者开始引入西方学科分类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并梳理中国历史文献资料和文化思想资源,并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人文学科。引入西方观念与方法,分门别类地研究整理中华文化,近百年来虽时断时续,成绩还是可观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遗留下模式套用、牵强解释的痕迹。

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认真反思和批评以往固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带来的不和与缺憾,许多方面还表达得很是尖锐、颇为深刻。例如,不断有学者质疑时下流行的中国哲学史体系的合法性,还不断有学者鼓动和倡导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的“重构”和“再写”,并开始了积极的尝试,这实际上都提出了中华文化史的进一步研究和整理,必须彻底摆脱西方模式的套用,突破分学派、定学科式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局限,在更高一阶的层面上展开整体的、系统性的探索和思考。犹如一个人在经历幼儿至青少年、再至中老年的过程中,总要不断地回顾、反思、总结自己的思想才能有进步那样,中华民族的文化智商及其精神价值的发生、发展、成长,也需要有持续的反思、自我批判、总结和重建来保持的。所以,深入思维智慧和精神价值的层次,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古往今来,似乎内在着一个肯定、否定、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或简括为正、反、合三阶段的发展过程。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认定中华文化的现代建设和未来发展,离不开一个前提条件:站在中华历史文化的否定之否定或是辩证综合的高度来加以推进。而借鉴五缘文化的理念和思路,就是试图突破既有眼界和研究方法的束缚,以辩证综合的智慧,回溯中华文化历史演变整体进程,以深入探讨和思考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

第二节 五缘文化:契入点与新思路

以五缘文化的理念和思路,采纳其提出的分析框架,对于我们揭示和把握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进而透视中华人文精神及其价值体系,是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的。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一、旨在重新确立研究新视角和契入处

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为内涵的五缘文化一说,是林其铨教授于 20 世纪 90 年代首次提出并进行阐述的。他指出:五缘文化研究“是以华族社会结构与人际网络为主要对象,并把自己定位于文化学的制度层面”。并强调:“制度行为文化同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是彼此相连不能截然分开的。”^①可见,基于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互动关系,着重在制度行为层面探讨和考察华族社会的人际结构网络,是五缘文化一说的特点。而具有这一特点的五缘文化,在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思路时,有助于我们根据于制度行为层面的人际关系结构,理解和把握中华文化体系的整体性内容;同时,五缘文化还代表一种文化的理念和思想,也为我们深化中华文化精神的研究探索,并拓展其应用广度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当然,仅仅确认文化所思考的社会人文状态是基于人际关系网络而建构起来的,这在东方和西方都有观念上的认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一著名论断:“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马克思当然是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提出这个论断的,却同时也揭示了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人都有共同的特性: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沟通和交往实际上都是社会关系的活动。而以人和人文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化学或文化史,当然不能回避以人际关系及其活动作为基本的、主要的内容。

西方文化的源头是作为犹太教、基督教正式经典的《圣经》。其中的第一部分,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圣录》三项,被称为《旧约圣经》,就是继承犹太教的《圣经》而来的。犹太教有“契约之宗教”的称誉。其经典《旧约圣经》就是上帝与犹太民族在西奈山下订的盟约,故又称《约书》。在犹太民族中有流传很久、很广的格言,称:“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与上帝签订了存在的契约之缘。”都肯定了人是通过契约与上帝建立缘分关系的。

契约是法定文本约束下,以双方相互了解、信任为前提的守约。以契约精神为特征的犹太教、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往往是决定性的,以致西方文化的许多先驱者在思考和阐述人际关系时,几乎都强调先要尽人与上帝的约定,然后才有人与人的约定。而这些约定关系就是以契约作为纽带,由信托承诺作出保证的。它的持久性、牢固度如何,靠的是人际间守约、履约的程度。正是在这样的意

① 林其铨、吕良弼:《五缘文化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论第 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义上,可以说,契约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源头性观念,一种基因性要素,一项基本精神的体现。

近代法国大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被誉为“人类解放的第一个呼声、世界大革命的第一个煽动者”,其开卷题旨就声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一方面基于天赋人权说,肯定每个人生而自由、平等、独立的,是天赋的权利,不可剥夺;另一方面,又意识到人总是处于许多束缚下的奴隶。这种通过对社会结构状况的透视所作出的概括,实际上也涉社会结构中的人际关系的理解。但卢梭的“天赋权利”观念和基督文化的上帝创世、人有原罪的思想有内在的渊源关系,他相信:“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秩序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问题在于懂得这些约定是什么。”^①这意味着卢梭理解的西方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是建基于社会契约理论的,实质上是各独立的个体按契约原则组成的关系结构,基本排除了人际缘分、心性情感因素的考量,很容易陷入个人本位主义、个体权利至上的窠臼。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文化所思考的社会和人文问题,在集中关注个人和群体的关系时,却是以肯定个人的独立与自由为前提,来设计人际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结构体。这实际上继承了古希腊学者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思想传统。

马克思曾探讨过西方社会中个人和群体关系如何导致个性独立、个人中心的问题。他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了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②马克思明确揭示出西方文化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在早期氏族家庭和氏族公社作为社会主要结构的条件下,西方人的人际关系还是有很大整体性、群体性的特征。只是到了18世纪的市民社会,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就成为人们实现私人目的的手段和工

① (法)让·雅克·卢梭:《卢梭文集·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第一卷题旨,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另附:此讲“约定”,指卢梭以前霍布斯、洛克等人的社会契约理论。

② 马克思:《1857—1858经济学手稿导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

